

南诏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的梳理研究

何金龙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118)

摘要: 南诏政权为确保洱海坝子心脏地带的安全,从统一洱海坝子起就开始在此着手逐步构筑相关的防御设施,经过前后近半个世纪三个阶段的苦心经营,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确保了洱海坝子特别是南诏都城的安全,使南诏得以在此基础上向四方发展扩张。此防御体系涉及陆地面积在300平方公里左右,如此庞大规模在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史及城建史上极为罕见。但今之研究南诏者未对“九重城”予以过注意,对洱海坝子的南诏诸城址只是逐城分别介绍。本文拂去了蒙在南诏“九重城”这一独具边疆民族地域特色的都城防御体系上的历史尘埃,让其重新呈现于世人面前,并首次对洱海坝子的南诏诸城址进行全面的整体综合梳理研究。

关键词: 南诏 都城防御体系 九重城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唐朝时期的边疆地区先后存在过数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如东北的渤海、北方的突厥、契丹、西北的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等。南诏¹是由西南边隅云南滇西的彝族所建立,最先发祥于滇西大理坝子²南边相邻的巍山坝子南部的蒙舍诏,后来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向北发展,先后兼并了同一坝子的蒙嶲诏、洱海坝子的石桥诏、石和诏、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和越析诏等,统一了洱海坝子及其周围地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王朝册封蒙舍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归义,称蒙归义,南诏政权正式建立。此时南诏国的疆土主要为洱海坝子及其东南西三面附近地区。

南诏立国后,随着势力的扩大、羽翼的丰满,已不再满足局促于洱海坝子,开始东进扩张,特别是“天宝战争”以后,如果说以前还要表面上维持与唐王朝的友好关系的话,现在则可以放开手脚大肆扩大势力范围了。因此,在公元八世纪中后期,南诏国东伐西讨、南征北战,从其建政的公元738年起至公元八世纪末期的约60来年时间内,其势力范围由小小的洱海区域扩大至北达川西的大渡河南岸,东至黔西,南抵越南及泰国北部,西含缅甸北部,远较今天的云南省大出许多,在历史上首次统一了云南,从此奠定了云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省的地域基础。

尽管南诏国的疆域广阔,但其能够实施有效统治的范围仅主要为滇西地区及滇中区域,这从其行政区划设置即可略见一斑。南诏的行政区划设置主要是十赕³、六节度、二都督。二都督设置于南诏连年用兵之地以利对外扩张,即会川、通海;六节度中仅有一个(即拓东节度)设于滇池区域的拓东城(今昆明)以镇摄治理滇中及滇东地区,另外五个(永昌节度、弄栋节度、银生节度、剑川节度、丽水节度)均设置在滇西地区,说明滇西地区对南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至于十赕(云南赕、白崖赕、品澗赕、邓川赕、蒙舍赕、大厘赕、苴咩赕、蒙秦赕、矣和赕及赵川赕)全都设置在洱海坝子及其周围地区的洱源、祥云、弥渡及巍山等几个肥沃坝子,这一区域是南诏国的发祥地、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根据地和心脏地带;十赕中又有八赕从东南北三面环卫着洱海坝子。洱海坝子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并先后建有南诏国的三座都城太和城(原名大和城,从宋初王溥《唐会要》始称“太和城”,

由“大”改“太”的原因不清，或许是笔误所致？整个宋代“太和”“大和”混用，从元代起均称“太和城”并一直沿袭至今）、大厘城⁴和阳苴咩城，从而成为南诏政权的心脏地带和赖以生存下去的根据地，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正因为洱海坝子对南诏政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南诏政权从统一洱海坝子起就开始着手逐步建立相关的防御设施，经过前后近半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从而确保了洱海坝子特别是南诏都城的安全。从史料来看，对此都城防御体系在明代以前——包括南诏当时——都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形容和称谓，到明代起方才出现对此都城防御体系的概括性称谓——九重城。

有关九重城的称谓记载，先后见于《寰宇通志》、《肇域志·云南志》、《古今图书集成》、《读史方舆记要》⁵等古籍中。前三书所记过于简单，仅限于提及此名称而已，且误认为是阳苴咩城“城有九重，基址尚存”，可能系听说一些民间传闻后，以为阳苴咩城自身有九重城墙，遂姑且记之；记载稍多者为最后一书，但也仅七十来字而已：“九重城，在府境。九重，犹言九座。《志》云：南诏境内有九重城，皆备土番（即吐蕃）而设，一在河尾里，一在关邑里，一在太和村，一在北国，一在蟠溪里，一在塔桥，一在摩用，其（余）二城则羊苴咩、史城也。”

前人虽然注意到了“九重城”的现象，但仅是简略提及而已，并且或语焉不详，或涵义不确，或误指。今之研究南诏史者也未对“九重城”引起过注意，对洱海坝子的南诏城址也只是逐城分别介绍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进行研究。本文将试图从洱海坝子现有实物遗迹可寻的南诏古城遗址着手，对“九重城”这一都城防御体系进行全面的整体综合梳理和探讨，对其形成的过程、各城建筑的先后年代、相互之间的关系、防御的主要方向及其价值意义等予以全面的研究阐述，使其得到应有的关注。

1 南诏之前洱海坝子的防御状况

洱海坝子在南诏进入之前即已有相当数量的城郭。“西洱河……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各据山川，不相役属……有城郭村邑”；⁶“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⁷当然这些城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只是用于部落村邑自身防御的军事性质的城堡，故其规模当比较小。由于洱海坝子“人众殷实，……无大酋长，好结仇怨，”⁸部落村邑之间没有统一组织，难免为了一些自身的利益而彼此间经常发生争夺械斗及流血冲突，为了保证本部落村邑的安全，修筑城堡是顺理成章之事，有多少部落村邑就当有多少城堡，其数量亦当是“数十百”。这些城堡依部落村邑的大小而大小，小者当不计其数，大者如石和城、石桥城、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邓川城等史书中有名有姓者。限于自身的人力物力，这些城堡不可能很大，城墙也不可能很高，能围住整个部落村邑并抵御外敌即可，即便是河蛮的（不是南诏的）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等大城也不会象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南诏遗留下来的这样西抵苍山东临洱海，东西向的南北两道城墙把洱海坝子拦腰截断。这从邓川城即可看出。邓川城建在洱源县邓川镇东北的德源山山顶上，城墙只是环山顶夯筑封闭起来自成一椭圆形城，而并未一直夯筑到东西两边的大山脚下，其周长仅约0.9公里，其东西直径最宽处不过195米，南北最长处也不过335米，面积仅约52700平方米⁹，一堂堂有名的大诏之城如此之小，其它小部落村邑之城之小更可想而知。

正因为洱海坝子的这些城堡规模很小，并且互相之间“不相役属”，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在唐开元年间，面对有唐王朝支持的南诏和邓赕诏联合南北夹击（“邓赕，……咩罗皮……与蒙归义同伐洱河蛮，遂分据大厘城”）¹⁰的进攻，这些“数十百”城堡中的大多数小城堡不堪一击，倾刻间被各个击破占领，南诏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而有关史书中都未提及。南诏遇到的较为抵抗强烈的城堡主要是石桥诏、石和诏、太和城、阳苴咩城、大

厘城及邓川城等规模较大的城堡，南诏夺取这些城堡之事在有关史料中均被简略提及，如“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¹¹ 大概由于遇到了强烈的抵抗，或许是南诏军队当时对攻城尚还缺乏经验，唐王朝曾派御史严正海协助南诏攻打石和诏、石桥诏等并统一洱海坝子：“洎先诏与御史严正海谋靖边寇，先王统军打石桥城，差诏与严正海攻石和子。父子分师，两殄凶丑”¹²。南诏和邓赕诏联合统一洱海坝子后，双方的势力范围划分大致上以大和城和大厘城之间为界，即南诏的势力范围为洱海坝子南半部，邓赕诏的势力范围为洱海坝子北半部，故才有皮罗阁夺据大和城、咩罗皮分据大厘城之载。但南诏和邓赕诏的联合对南诏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数月后南诏待自己力量强大便北上进攻咩罗皮，占领了大厘城，不久之后南诏又乘胜占领了邓赕诏的所在地邓川城（“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大厘城”；“邓川城，……与南诏战败，……遂有城”）。¹³，自此将整个洱海坝子全部据为己有。

由于统一洱海坝子有功，并且可以利用其来牵制吐蕃，在南诏统一了洱海坝子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对南诏便予以承认，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归义，南诏这个地方政权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2 南诏在洱海坝子北部的防御设施

南诏对洱海坝子早就觊觎垂涎，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西有苍山之险、东南两面有洱海之堑，可供防御外敌之侵，实为建都立国的好地方。因此，在统一了洱海坝子并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册封后，南诏于739年定都洱海坝子南部的太和城。为确保这一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南诏开始逐步构筑有关的防御设施。

如前所述，洱海坝子在南诏占领前即已有数百城堡，但大多数都很小，在南诏的攻击下不堪一击。由于太小，被占领后对于南诏的防御没有什么用处，留下来倒易成为河蛮骤众反叛的堡垒，于是其城墙很可能要么被夷平，要么被废弃。至于被南诏攻占的规模较大的城堡如太和城、阳苴咩城、大厘城等，因“河蛮遂并北迁，皆羁制于浪诏（今洱源、鹤庆、剑川一带）”¹⁴，人去楼空，应当正好可以供南诏军队及其家属等至少暂时居住及防御之用。

是时，南诏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逐步统一洱海坝子，势力得以扩张，但其北面的吐蕃对洱海坝子虎视眈眈，“遂并北迁”并受到吐蕃庇护的河蛮亦时刻欲卷土重来。南诏面对来自北面的威胁和压力不敢掉以轻心，在占领大厘城后，马上在其北面洱海坝子北端苍山洱海间的狭窄陡坡上修筑要塞龙口城据以扼守，以保障南面的大厘城、阳苴咩城等大城邑、都城太和城及整个洱海坝子的安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大厘城，乃筑龙口城为保障”¹⁵。龙口城后来又名龙首关，从现有史料来看，它可能是南诏在洱海坝子新筑的第一座城。此时南诏尚未立国，更还未定都太和城，不忙于定都立国，而是马上修筑龙口城，足见北面的吐蕃对南诏的威胁和压力有多大，同时也说明南诏已决意在洱海坝子定都立国。从现存遗址来看，龙口城位置确实极为重要（徐霞客有云：“西山之支，又横突而东……，盖点苍山北界之第一峰也。……当山垂海错之处，巩城当道，为榆城北门锁钥……，以据洱海上流也。”）¹⁶，它地处苍山洱海北端之始稍南，在此苍山脚几乎为狭窄陡坡直达洱海边，地形十分险要，城即建在这东西均为天堑的狭窄陡坡上。该城筑有东西向各长约800多米的南北两道城墙横亘在苍山洱海之间，把此南北向狭窄通道东西向拦腰截断，扼守住了由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陆上通道，以便南诏可以放心经营建设洱海坝子这个心脏地带。龙口城当即《读史方舆记要》中所言的摩用。

南诏占领大厘城后，原来占据大厘城的邓赕诏向北退回老巢邓川城，联合浪穹、施浪二诏，举三诏（史称“三浪”，“凡浪穹、邓赕、施浪，总谓之浪人，故云三浪诏也”¹⁷）之兵力向南进攻南诏，复惨遭败北，南诏乘胜追击占领了邓川城，“复入邓赕，即与浪穹、施浪两诏援兵伐归义。于时归义既克大厘，筑龙口城，闻三浪兵至，率众拒战。三浪大败，追奔

过邓赕，败卒多陷死于泥沙之中。咩罗皮从此退居野共川（今鹤庆一带）”¹⁸；“归义夺邓赕”¹⁹。邓赕诏非但未夺回大厘城，反而连自己的根据地邓川城也被丢失，并且逃得远远的，一直逃到鹤庆坝子为吐蕃所庇护。而南诏，从其占领大厘城后即筑龙口城来看，它原本不欲或者至少暂时不欲马上北上攻打邓赕诏的（其原因一可能是邓赕诏主咩罗皮乃南诏王皮逻阁之甥，二可能是南诏此时尚未在洱海坝子占稳脚跟），现在三浪打上门来，凭借刚新筑好的龙口城，南诏不但打败了三浪，而且还乘机北进占领了邓川城，这样，从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水陆咽喉要道全部被南诏所控制。

邓川城的位置相当重要，地处由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战略要地，它“南去龙口城十五里”²⁰，“有小山横亘坞中，若当门之槛。截坞而出者，是为德源城（即邓川城），盖古迹也。山横坞中不甚高，而东西两端，各不属于大山。山之西与卧牛（山）相夹，则罗莳江与邓川驿路从之；山之东与西山湾山相夹，弥苴怯、闷地二江从之”²¹，也就是说，邓川城所在的小山既控制沿苍山麓进入洱海坝子的陆路，又控制从洱海北端进入洱海坝子的水路，还控制通向洱海东部海东地区的陆路²²。这真是大自然赐给南诏的一个位置地形绝佳的天然要塞。如果说龙口城仅控制从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陆路咽喉要道而还未控制从洱海北端入海或从海东迂回入侵洱海坝子的水上通道的话，那么，占领邓川城之后，南诏已完全将北面的无论是从陆上还是水上进入洱海坝子的通道全都控制在手上。

邓川城在南诏占领之前即已有之，南诏占领之初的皮逻阁时期是继续沿用原有之城还是马上进行了增修扩建，史料对此无载。照理推测，如原来的城足以抵御北面的吐蕃和北逃的河蛮，则没必要增修扩建；如原来的城或毁或残或规模太小而不足以抵御北面的吐蕃和北逃的河蛮，则南诏肯定会对之加以增修扩建，因为此时对南诏的威胁只有来自北面的近在咫尺的吐蕃、北逃的河蛮及败溃的三浪残余，南诏不可能不予以高度的重视，这从史料中亦可看出其重视，“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邓川来往”²³。阁罗凤为何要在三城之间来往呢？大和是都城，是其长期居住之地自不用说；大厘城“邑居人户尤众”²⁴，是繁华热闹之市，去看看热闹，了解了解民情也在情理之中；而邓川位于洱海坝子北端，一过此城即为时刻觊觎洱海坝子的吐蕃、北逃欲卷土重来的河蛮和三浪残余，阁罗凤去哪儿干什么呢？只能解释为邓川城对南诏的安全太重要了，阁罗凤放心不下，时刻都要去巡视一番，足见其重视程度。皮逻阁时期是否对邓川城进行增修扩建史料无载，但阁罗凤及异牟寻时期数次的增修则有案可查，“邓川城……，自阁罗凤及异牟寻皆填固增修，最为名邑”²⁵。阁罗凤即位才两三年就与唐朝发生了著名的“天宝战争”，并同时转而投靠吐蕃，当然不会再与吐蕃为敌，他又死于779年，其填固增修邓川城就只可能在天宝战争之前仍与吐蕃为敌之时，也就是刚即位时或不久（阁罗凤即位于748年），可见即便南诏已建国十来年，但来自北面的吐蕃的威胁仍时刻让南诏提心吊胆，经常要对邓川城“填固增修”；至于异牟寻时期，已复与吐蕃决裂为敌，“填固增修”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存遗址来看，邓川城与洱海坝子的其它南诏城址截然不同。它不象洱海坝子的南诏城址是从苍山麓直至洱海畔东西向把洱海坝子拦腰截断，而只是在德源山山上环山顶夯筑一椭圆形的封闭起来的城墙，并未一直夯筑到东西两边大山脚下；其周长仅约0.9公里，面积并不大，仅约52700平方米，其东西直径最宽处不过195米，南北最长处也不过335米。之所以如此，可能由于此地地形奇特险要，凭此已足以抵御北面之敌；另外如要筑城墙至东西两边山脚，其规模太大，没那人力物力；退一步讲，即便邓川城失陷，还有龙口城可退守。

至于大厘城（又称史城），“邑居人户尤众。咩罗皮多在此城，并阳苴咩并邓川，今并南诏往来所居也，家室共守，三处如一”、“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邓川来往”²⁶。邓赕诏主喜欢来这里，南诏王室也喜欢来这里，为何？从“邑居人户尤众”来看，大厘城大概原本就是一座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的城市（大厘城即今喜州，今仍是洱海坝子除大理市区、大理古城外最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经济发达的乡镇村邑，其它乡镇无谁能与之一比），南诏王室自然会

经常来此居住游玩看热闹，更何况异牟寻即位后出于生活舒适的考虑等，加之此时诏蕃和好，唐朝的势力早已退至大渡河北岸，曾将都城从太和城迁于大厘城²⁷，必然会对大厘城加以增修扩建以保障其安全。由于千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大厘城的城墙今于地面已无存，但当地今仍有城东、城南、城北等地名。从洱海坝子的其它几座南诏城址来看，大厘城亦应有西起苍山之麓、东抵洱海之滨、东西向把洱海坝子拦腰截断的南北两道城墙。这样，既保护了城自身，又可作为太和城、阳苴咩城等都城的第三道屏障。

在大理古城北约 7 公里的阳苴咩城与大厘城之间，另有一道东西向的夯筑土城墙即“三阳城”，它西起苍山三阳峰麓，东抵洱海畔，长达 3 公里多²⁸，保存最好处高出地面约 6 米，墙基宽约 10 米，城因山名。此城正史无载，仅野史提及，如《南诏野史》隆舜传云“光启二年（886 年），地震……三阳城崩”²⁹。从名气太小、正史无载、建筑年代不清及目前只发现一道城墙（可能本来也只有一道城墙）来看，三阳城当只是一道军事防卫性质的城墙，而不是民居之城，其建筑年代只可能在南诏建国以后，为南诏新筑，南诏占领洱海坝子之前互“不相役属”的河蛮是不会构筑如此大规模的单道城墙的，而只可能是互相独立的环形城堡。至于是筑于天宝战争之前的与吐蕃为敌时期，还是筑于天宝战争以后至 779 年间的诏、蕃和好时期，或是筑于公元 779 年南诏迁都阳苴咩城之时或之后不久的与吐蕃积怨时期，乃至筑于南诏与唐王朝复好的苍山会盟（794 年）以后，窃以为筑于迁都阳苴咩城之时或之后不久的诏、蕃积怨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天宝战争之前，其北面有邓川城、龙口城、大厘城等三道防线，完全足以确保都城太和城的安然无恙，况且南诏有唐朝的支持，吐蕃也不敢贸然来犯；至于天宝战争以后到 779 年间的诏、蕃和好时期也不可能筑此城来防御北面的盟友吐蕃；而苍山会盟以后，吐蕃在南诏与唐朝的夹击之下溃不成军，其南边的势力范围由邓川以北的邓川坝子而退回到滇西北的迪庆州及以北地区，从此以后对洱海坝子再也未构成威胁，只有南诏去攻打它，还筑三阳城干什么？而南诏之所以迁都阳苴咩城，其原因是 779 年南诏与吐蕃联军犯川欲取成都，为唐朝军队所大败，吐蕃迁怒于南诏，“异牟寻惧，更徙苴咩城”、“以为不安，遂改创阳苴咩城”、“贞元中，异牟寻寇西川败还，惧，筑羊苴咩城……，徙居之”³⁰。经笔者实地考察，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阳苴咩城的地形较缓而平坦，不如太和城易守难攻。可能南诏统治者也看到了这一点，鉴于北面的吐蕃一直对洱海坝子垂涎觊觎，在此时迁怒于南诏并可能乘机对南诏有所动作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新都阳苴咩城的安全，除了加强阳苴咩城自身的防御设施外，在其北面已有邓川城、龙口城、大厘城等三道防线的基础上仍不放心，于大厘城与阳苴咩城之间新筑三阳城，从而在阳苴咩城以北形成了四道防线。所以，三阳城的修筑年代很可能在南诏迁都阳苴咩城与苍山会盟之间。这期间，南诏既已与吐蕃有了积怨，矛盾重重，又尚未与唐朝复好从而得到唐朝的支持，只有独自面对来自吐蕃可能的威胁，处境最为艰难，此时修筑三阳城显得尤为必要。该三阳城当即《读史方舆记要》中所言的塔桥城³¹。

阳苴咩城原亦为河蛮所建城郭之一，南诏统一洱海坝子后至 781 年左右作为新都城前之间，似乎未对该城进行过增修扩建，正史中此期间也没有南诏王室来此活动的记载，可能在此期间阳苴咩城这个原河蛮的城郭只是被南诏一般沿用而已，规模也不大，因而对都城太和城来讲它并不构成北面的一道防线。

综上所述，南诏统一洱海坝子后至 794 年间，为了对付来自北面吐蕃的威胁，先后新筑了龙口城、三阳城，对邓川城、大厘城等则填固增修扩建，在北面构筑了四重防线，以确保都城太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及洱海坝子的安全。事实上确也如此，北面的吐蕃或者欲卷土重来的河蛮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踏入过洱海坝子。

3 南诏在洱海坝子南部的防御设施

南诏在天宝战争以前与唐朝友好，并得到了唐朝的大力支持统一了洱海坝子，此时它所

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的吐蕃和北逃并受到吐蕃庇护的河蛮，因而在北面先后构筑了邓川城、龙口城、大厘城等三重防线。其南面则基本没有任何防御设施，这一方面是由于南面有天险西洱河可凭借以资防御，另一方面是南面无敌可防，唐朝是盟友，巍山坝子、弥渡坝子等是自己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不需要任何防备。即便原来攻占的河蛮石桥城，因为南面不存在军事威胁，对攻占的石桥城可能废置不顾”³²。第一次天宝战争时，鲜于仲通率领的唐军连西洱河都未攻过去，使得南诏以为凭借西洱河天险已足以防御南面的威胁，故在西洱河北岸也未构筑什么防御设施，因而当第二次天宝战争爆发后，“战事不是首先在龙尾城展开攻守战，阁罗凤是将李宓的孤军‘诱之至太和城，闭壁不战’，然后再与吐蕃联军夹击而歼灭唐李宓军的，这表明天宝战争时，龙尾城尚未修筑，天宝战争唐李宓军可长驱直入直逼太和城下，这就显示了在南路原石桥城一线修筑城垒以拱卫都城太和城的必要性”。³³ 说是诱之，实际上恐怕是李泌所率军队比第一次天宝战争时鲜于仲通的军队战斗力更强，因而西洱河天险被攻破，李泌的军队直逼太和城下。

第二次天宝战争时唐李宓军队比第一次天宝战争时鲜于仲通的军队能攻善战，竟攻破没有防御设施的西洱河天险而“深入至太和城”³⁴，使南诏不得不考虑南面的防御问题，尽管此战最后以南诏胜利而告终，南诏还是立即着手修筑南面的防御设施龙尾城。“龙尾城，阁罗凤所筑。萦抱玷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³⁵，明言龙尾城为阁罗凤时期所筑，筑于苍山斜阳峰南麓的西洱河北岸，借用西洱河的高差修筑城墙，故临河一面高达 10 米左右，城墙东起大关邑村，西至天生桥，长 4 公里多，但今已所剩无几，仅存打渔村附近约 250 米一段。龙尾城亦为单城，即只有一道从苍山麓顺山而下然后沿西洱河北岸东去的城墙，其军事防御性质一目了然，而非为居民之城，纯属防御之用。龙尾城当即《读史方舆记要》中所言的河尾里。

从现在所存遗址来看，南诏在洱海坝子南面仅修筑了龙尾城以资防御，此外即再未另筑它城，十几年前南诏统一洱海坝子时攻占的石和城可能亦早已被废弃不用。南诏在南面的防御设施较之北面似乎显得薄弱，北面至少有三重防线，而对于都城太和城来说，南面则只有一重防线，即便 779 年后迁都大厘城及阳苴咩城，其都城南面亦只不过再增加了太和城一道防线而已，也仅两重防线。究其原因，推测一是南面的威胁始终没有北面大，第二次天宝战争时李宓的军队尽管深入到了太和城下，但南诏凭借太和城坚固的城墙仍以胜利告终，故对太和城的防御能力还是有信心的，后来又凭借西洱河天险修筑了龙尾城，多增加了一、两重防线，更当无南面之忧；另外，从西洱河以南的地形来看基本都为平坝地区，无天险可凭借以资筑城，实在要筑的话也只能在平坝地区筑城，既阻挡不了来犯之敌，反而倒可能被围而歼之，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筑。再者，当初李宓的军队之所以能深入到太和城下，恐怕与事发仓促，南诏原本不打算（或至少是暂不打算）与唐朝为敌，因而来不及进行战争准备，或对唐朝军队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对自身的防御能力又太过自信轻敌有关。如打算与唐朝为敌并又不自信轻敌的话，只须在龙尾城处予以准备，严阵以待，李宓的军队恐怕无论如何也过不了西洱河天险，更不用说深入到太和城下了。况且，自天宝战争以后，南诏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吐蕃已成为它的盟友，唐朝的势力范围已退出云南而缩至大渡河以北，再也没有对南诏构成过威胁，南诏不但未处于守势，反而以攻为守四面扩张，其势力范围大到远远超出今天的云南省的区域，把现今周边省和周边国家的一部份也据为己有，只有它去进攻别人，却再也没有谁来入侵过南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诏因自身内部矛盾激化而灭亡。

4 南诏都城自身的防御设施

尽管南北两面已有了数道防线，但南诏统治者仍不放心，担心有朝一日敌人会兵临城下（这种担心在第二次天宝战争期间得到了证实），因而对都城的修筑都是以假设敌人会攻至城下来考虑的，故其城墙均西起苍山之麓，东抵洱海之滨，东西长达三、四公里，仍是东西向南北两道城墙把洱海坝子拦腰截断，不让敌人有从苍山上或洱海畔迂回攻入城内的可乘之

机，对城墙的夯筑质量亦格外重视，第一次天宝战争后即对太和城的城墙进行加固。以笔者领队调查勘探过的太和城为例，其在山坡上的城墙多以碎岩石掺少量泥土夯筑得相当坚硬，有的地方竟坚硬如石，虽地处陡峭山坡仍历千年风雨而不倒，现仍残高6.6米，底残宽7.1米，在地势较缓地带的城墙，今残宽竟达14余米，残高10米左右，其当初的坚固雄伟易守难攻不言自明，难怪第二次天宝战争中李宓的军队尽管已攻至太和城下，却仍拿此城奈何不得，反遭败绩。有坚固的外城墙还不放心，南诏统治者恐怕外城被攻破，在城西端地势陡峭的小山核桃山上又修筑了内城，以便外城一旦被攻破可上山退守内城。就这样仍还不放心，因为内城东端地势稍缓，在内城的东端又再修筑圆形瓮城。内城内又筑瓮城，这种现象极为少见³⁶。南诏统治者对安全的担忧到了何等的程度。当然，南诏统治者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在第二次天宝战争期间，尽管唐朝军队已攻至太和城下，但面对南诏的强烈抵抗和坚固的太和城城墙始终没有办法，最后以唐朝军队失败主将沉江而死告终。

后来的另外两座都城大厘城、阳苴咩城，由于史料所载太少及未进行过考古勘探，其自身的防御设施情况不太清楚。对于阳苴咩城，现仅知其北城墙位于梅溪南岸，是利用天然溪河来作城濠即护城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其城墙于地表尚存约1公里，残高约4—5米，墙基厚约6—8米，据大理市文化局长杨吕泽先生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他还见过此城墙部分表面垒砌有一层卵石，推测当为保护城墙表面之用。

5 南诏在洱海坝子都城防御体系的归纳及阶段划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南诏在洱海坝子先后构筑了多重防御设施，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而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其目的当然首先是要确保都城的安全，其次是要确保洱海坝子这一南诏政权赖以维持生存下去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使南诏得以在此基础上向四方发展扩张。

洱海坝子的自然地理为南诏构筑这一完整严密的都城防御体系提供了绝佳的地形地势，西有海拔达4000多米的苍山，东有海拔仅约1970米、时常狂风大作波涛滚滚的洱海，南有急流奔腾的西洱河，山湖间的相对高差达2000多米，东南西三面皆为天险，将洱海坝子三面包裹起来，形成天然防线（《滇略》云“点苍山……阴崖积雪，经夏不消”、“西洱河……‘此水可当兵十万’”，可见苍山洱海的天险作用）³⁷，至于北面，大自然也赐予南诏邓川城及龙口城所在的这两块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这两处的地势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住了从北面进入洱海坝子的水陆要道。这样，洱海坝子四面皆有险可守，再加以陆上重重设防，逐城防守，可以说确实固若金汤。

当然，这一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是随着形势、时间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充实完善，分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在刚基本统一洱海坝子之初而尚未建政之时，面对北面吐蕃和北逃之河蛮的威胁，南诏马上新筑龙口城，筑就了北面的第一道防线；不久，又击溃三浪诏的进攻并乘胜追击夺取了邓川城，邓川城取代龙口城成为北面的第一道防线，龙口城退居为第二道；在上述两道防线的基础上，此时唐朝已册封南诏，遂先增修扩建太和城为都城，然后由于大厘城是南诏人口众多繁华热闹的都市，也会对其进行增修扩建，既可保护大厘城自身及为到此游玩而筑的南诏王室行宫，又可作为保护都城太和城的第三道屏障。这样，在天宝战争之前，南诏在都城太和城以北先后构筑了三道防线，而南面则一道也没有，因为南面是其发祥地和根据地，东面属唐朝势力范围，而南诏此时尚与唐朝和好，自然不需防备，也就无须构筑防御设施。至于太和城有南北西三面环绕且极为坚固的城墙，此乃一国之都城所必需，而不是专门针对谁的。此时期南诏在大理坝子以都城太和城为防御中心的特点是仅防北面，防线数为“北三南无”。

第二阶段：天宝战争后，南诏接受唐朝军队曾攻至太和城下的教训，新筑龙尾城，构筑了南面的第一道防线以防御唐朝的军队，北面则因与吐蕃结盟而未变。779年，异牟寻即位后迁都大厘城，太和城自然成为新都大厘城南面的又一道防线，但实际上此时没有什么敌人需要防御的，诏、蕃和好自然不需要防御，唐朝的统治范围已收缩至大渡河北岸，对洱海坝子也早已构不成什么威胁，故此时期没有构筑新城，只是继承沿用原防线而已。此时期南诏在大理坝子以太和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其特点是也考虑南面的防御，其防线数为“北三南一（或二）”。

第三阶段：由于诏、蕃联军攻西川失败，在与吐蕃有了积怨并从大厘城迁都阳苴咩城的情况下，为了防御来自北面吐蕃对新都城阳苴咩城可能的威胁，南诏在原已有邓川、龙口及大厘三道防线的基础上，又新筑三阳城为第四道防线，南面仍为龙尾城及太和城两道防线，这一时期以新都城阳苴咩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其特点是南北两面都防，其防线数为“北四南二”。

至此，经过三个阶段的苦心经营，南诏在洱海坝子的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终于构筑完成，从737年开始至794年之前完成，南诏为此前后花了半个世纪左右。

兹将此都城防御体系的构筑过程、阶段划分、防御中心及防线重数简列如下：

第一阶段 公元737年——750年，天宝战争之前，都太和城，防线北三南无；

第二阶段 公元754年——779年，天宝战争之后，都太和城，防线北三南一；

第三阶段 公元781年——794年，诏蕃积怨时期，都阳苴咩城，防线北四南二。

南诏在洱海坝子“北四南二”的都城防御体系从此定型直至公元902年南诏灭亡，并一直为后来的云南白族地方政权大理国（大致与宋朝相始终）所沿袭，其中的几道城墙甚至直到云南已为中央王朝统治的元明时期都还被加以维修加固以发挥其防御作用，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³⁸。而在南诏时期，从史料来看，除了天宝战争期间唐朝军队攻入外，以后再也没有外敌攻入进过洱海坝子。而唐朝军队之所以能攻入，与事态仓促及南诏原并不想（或至少是暂不想）与唐朝为敌而缺乏准备有关。之所以以后再没有外敌攻入，一方面固然是南诏已经强大，其统治范围已远较今云南还大，外敌被阻于数百千里之外，根本接近不了洱海坝子，另一方面与南诏有一套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令别人不敢来惹也不无关系。

6 结语

从前所述可以看出，在洱海坝子的南诏这个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中，每城之间不是孤立无援独自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城城相扣逐城防守的，其中心就是首先确保南诏都城、其次是洱海坝子这个南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因而，对洱海坝子诸南诏城址的研究应该是把它们纳入一体整体综合进行，而不是拆散孤立开来，因为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每一座城址都是这个防御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份，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上所述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天宝战争之前第一阶段的以都城太和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的北三南无、还是天宝战争之后第二阶段的北三南一、及至第三阶段诏蕃失和后以新都阳苴咩城为防御中心的防线的北四南二（或北六南三），南诏所面临的威胁均主要来自北面的吐蕃。对于南面，南诏似乎就未过多考虑有什么敌人需要防御的，即便是天宝战争后南诏在西洱河北岸新筑了龙尾城，但也仅一道防线而已，就算后来南诏迁都大厘城和阳苴咩城，太和城自然成为南面的另一道防线，南面也仅两道防线，只是北面的一半，就算有关史料记载确实无误，北面加上北国、蟠溪里，南面加上关邑里，南面仍还只是北面的一半，看来仍未把唐王朝视为会有多么大的威胁，换句话说，南诏根本就没有把唐王朝的威胁放在眼里，吐蕃一直是南诏最大的威胁。

对于南诏在洱海坝子这个最后定型的完整严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其防线重数现在的考古发现有实物遗迹的仅六重，加上防御的中心都城阳苴咩城亦仅七重；而《读史方舆记要》中所言城名确凿的是九重，且并未包括邓川城在内（而邓川城是应包括在内的，它是这个都城防御体系中北面最关键的一重），如加上邓川城则应为十重城，但现在考古发现有实物遗迹的仅七重，如有关史料记载确实无误而不是凑数以九言其多的话，那另外三重（南面的关邑里、北面的北国、蟠溪里）则有待于以后田野考古工作的发现了。如果确有此三城，那这个以阳苴咩城为防御中心的多重防御体系就不是“北四南二”，而是“北六南三”了，刚好是九重，如加上阳苴咩城则为十重。

不管是七重还是十重，如前所述这些城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防御体系，前人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故才有“九重城”之说。“九重城”一名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见于明代，但窃以为此名出现的时代应当更早，或许应在南诏中晚期，即公元九世纪，之所以称“九重城”，可能即是南诏统治者对此防御体系坚固的自我炫耀，而就一般而言，后代之人很少有对前朝的人、事、制度等大加夸赞的。那为何此称呼不见于明以前包括南诏时期的史料记载呢？众所周知现存的南诏史料少得可怜，基本上仅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和新旧《唐书·南蛮传》而已，新旧《唐书·南蛮传》又主要依据《云南志》而撰，《云南志》又主要抄自唐代袁滋的《云南记》，袁书早已佚，其所述南诏之事仅限于南诏前期即公元八世纪，那时此防御体系刚建成不久，可能尚未有“九重城”之说，即便有此说因正忙于与唐王朝修好可能也不便向中央王朝炫耀，袁滋也就不可能记入书中，之后南诏实际上即又与中央王朝相隔绝，中央王朝对南诏中后期的情况一无所知。元王朝虽然恢复了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和控制，但由于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助元平定云南有功，大理地区仍单独设立有由原大理政权段氏世袭的大理国总管来统管滇西地区，俨然国中之国，有关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大量档案史料仍密藏于总管府内外界不得而知。进入明代，总管府虽然被撤消，但总管府内的文献档案多数出于摧毁地方民族文化以利统治的需要，被明军纵火焚毁，“沐英始至云南，尽取其图籍焚之”³⁹，只有少数散落民间，故正史中不见“九重城”之称，仅在少数稗官野史中简略提及。

因此，窃以为对大理洱海坝子南诏时期的这些城址既然如前所述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一个体系总得有个名份或称呼，那么还是应该还此防御体系的历史本名“九重城”这一传统称谓，起码以九言其城多嘛！但需要澄清的是，是整个洱海坝子（包括邓川城在内）都城防御体系的“九重城”，而不是“阳苴咩城……城有九重”，因为此多重防御体系不仅是保证都城阳苴咩城的安全，还要保证整个洱海坝子的安全。当然，也可能“阳苴咩城……城有九重”中的“阳苴咩城”是对整个洱海坝子南诏诸城址的归纳或是“九重城”的别称，倘如此，那又另当别论了，但现在还无这方面的证据。

洱海坝子如北从邓川城算起，再南至西洱河，其南北长约 50 公里，其东西最宽处约近 8 公里，总面积约 500 多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约近 300 平方公里。在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吐蕃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都城及整个洱海坝子这个南诏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的安全，南诏政权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分三个阶段构筑了如此一个平均每隔 5 公里就有一座城的独具边疆民族地域特色又规模巨大完整严密有效的“北四南二”（或“北六南三”）的都城防御体系——九重城，这在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史、城建史上恐怕是极为罕见的，况且此防御体系位于西南边陲一隅的偏僻之地且是由所谓“蛮夷”的云南少数民族构筑就更显珍贵和难得，这正是其历史意义及研究价值之所在。如果这些城墙至今都还全部完整保留着，倘乘飞机从空中鸟瞰俯视，那将会是多么的宏伟壮观和气势磅礴，真令人有叹为观止之感。

-
- ¹ 虔为当时当地少数民族之语，其意思说法不一，或谓部落，或谓王，或谓大首领大酋长，或谓区域。一般认为是大的部落之意。
- ² 云南人称山间盆地为坝子。
- ³ 贲约略为州之意。
- ⁴ 大厘城曾为南诏都城之事学术界多持怀疑或否定，笔者认为当确有其事，详由请参见拙文。大厘城确曾为南诏都城考——兼论异牟寻是由大厘城而不是由太和城迁都阳苴咩城[J]. 云南文物, 2000, (2), 此不赘述。
- ⁵ 明.寰宇通志·大理府·古迹[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第七卷, 141。
- 明.肇域志·云南志[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五卷 636。
- 清.古今图书集成[M]. 1469。
- 清顾炎武. 读史方舆记要[M], 卷 117,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五卷 767。
- ⁶ 唐杜佑. 通典[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一卷 452。
- ⁷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⁸ 资治通鉴[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一卷 626。
- ⁹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德源城遗址考古的新收获[J]. 云南文物, 2002, (2)。
- ¹⁰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04。
- ¹¹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5。
- ¹² 见有关. 南诏德化碑[Z]碑文。
- ¹³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5—186、195。
- ¹⁴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45。
- ¹⁵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5—186。
- ¹⁶ 朱惠荣. 徐霞客游记校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981—982。
- ¹⁷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02—103。
- ¹⁸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04—105。
- ¹⁹ 新唐书·南诏传[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M].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一卷 402。
- ²⁰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5。
- ²¹ 朱惠荣. 徐霞客游记校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979—980。
- ²² 林荃. 南诏城址概说[A]. 南诏文化论[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245。
- ²³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6。
- ²⁴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2。

-
- ²⁵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5.
- ²⁶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92、186。
- ²⁷ 元史·地理志 [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3卷 82. 对于大厘城曾为南诏都城一事, 尽管元史·地理志有载, 但史学界一般持怀疑态度, 笔者认为确有其事, 详见拙文. 大厘城为南诏都城考 [J]. 云南文物, 2000, (2).
- ²⁸ 邱宣充, 张瑛华. 云南文物古迹大全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484.
- ²⁹ 木芹. 南诏野史会证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166.
- ³⁰ 新唐书·南蛮传 [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一卷 390.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6. 读史方舆记要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五卷 766.
- ³¹ 吴金鼎, 曾昭燏, 王介忱. 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 [M]. 前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一, 1942. 6.
- ³² 林荃. 南诏城址概说 [A]. 南诏文化论 [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239.
- ³³ 林荃. 南诏城址概说 [A]. 南诏文化论 [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238.
- ³⁴ 资治通鉴 [M].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第一卷 631.
- ³⁵ 赵吕甫. 云南志校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9.
- ³⁶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理太和城遗址调查勘探报告 [J]. 云南文物, 1999, (2).
- ³⁷ (明) 谢肇淛. 滇略·胜略 [A].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第六卷 671、672。
- ³⁸ 林声. 南诏几个城址的考察 [J]. 云南学术研究, 1962, (11).
- ³⁹ 清·师范: 滇系 [M].

Analysis on the defense system of Nanzhao capital

He Jin-l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650118)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ense system of Nanzhao capital, points out that this system was particular in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defense in China.

Keywords: Nanzhao; capital defense system; nine circular city

收稿日期: 2004-4-12

作者简介: 何金龙(1957-), 男(汉族), 现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云南古城址方面的野外考古及研究.